

※世變中的文學世界專輯Ⅱ※

「世變中的文學世界」系列座談會之四 唐宋文學研究的新趨勢

蔣宜芳記錄*

時 間：1998年12月7日

地 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樓會議室

主持人：衣若芬女士（本所助研究員）

引言人：陳弱水先生（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羅鳳珠女士（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講師）

衣若芬女士：

各位專家學者，大家好！非常歡迎各位來參加文哲所舉辦的「世變中的文學世界」研究計劃第四次座談會，今天討論的主題是「唐宋文學研究的新趨勢」，我們請到的兩位引言人分別是；本院史語所的陳弱水教授，以及元智大學中語系的羅鳳珠女士，他們要分別從文化思想史、士人家族的角度，以及如何將資訊科技運用到文學研究上這兩方面，來談一談二十一世紀的唐宋文學研究在思考層面，以及在方法策略上可以展開新的方向。關於今天座談會的進行方式，仍舊和我們這個計劃前幾場座談會的方式一樣，我們先請兩位引言人各講三十分鐘引發議題，再請在場的學者專家提出個人的見解或是疑問，和引言人交換意見。現在就請陳弱水先生開始，陳先生今天所要談的議題是「唐代中葉的時代變遷與文學變遷」，請陳先生開始。

* 本所約聘研究助理。

陳弱水先生：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個人今天報告的題目是「唐代中葉的時代變遷與文學變遷」，這是切合本系列座談會主旨的議題。個人是研究歷史的，接觸唐代文學的資料主要是從思想史的角度出發。研究歷史的人對於思想的研究，特別注意思想與時代環境之間的關係。由於個人的專業背景，對一般歷史環境方面的問題比較敏感一點，希望今天提出的看法，能對研究文學的各位先進、朋友有所助益。

我今天並不是要提出任何系統的見解，只是要針對兩個問題表示初步的看法，而其中一個，前人的討論可說已是成篇累牘了。在進入我想著重討論的兩個課題之前，個人先要對唐代中葉文學變遷的一般背景表達一些看法，這樣才能導入我想著重的問題。我題目中所說的唐代中葉，主要是指從八世紀中葉（安史之亂稍前、玄宗朝末期）到九世紀初，也就是到憲宗末期，公元 820 年左右。大概有七、八十年的時間。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知道，文學是唐代士人文化內容的主要成分，可說是核心成分，不但文學活動的地位特高，而且跟現實利益的關係很密切。文學活動與仕進之途的密切關係，當然對文學寫作的蓬勃有所幫助。

唐代文學的內容很複雜，除了一般所謂的通俗文學，就士人的文學活動而言，至少可以區分出三個主要層面。一個是詩風，也就是詩歌方面的發展。一個是文風，屬於文章寫作的方面。另外一個則是文學思想。我想提出的看法是，這三個層面的演變步調常常不一致，不見得是一起變化，所以我們談文學變化，至少就我個人稍微有所了解的唐代文學來講，文學思想的變化，並不一定在創作實踐上引起重要的反應。譬如唐代中葉是詩風跟文風有所變遷的時代，但是詩與文章發展的軌跡不完全吻合。與中唐思想關係最密切的，當然是文章寫作方面的變化，也就是所謂的古文運動的興起，這就是我今天所要討論的主題。我想強調，古文思想與創作實踐的發展有不一致的地方，一般來說，是思想先行，創作走在後面，而思想本身也不是停滯不動，也有自身的變化，我們要避免把這些關係看得太機械。古文運動和「世變」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這是學者都同意的。而我們一般所謂的「世變」就是指安史之亂，以及這個亂事所帶來重大的政治、社會變動。唐代的士人突然受到安史之亂的衝擊，思考這場動亂的原因，覺得這是長久以來倫常失序的緣故，他們認為，重建倫理、重振王綱是當務之急，文學也應該復古，為政教服務，這是一般的基本看法，這個看法有堅強的史實根據，我個人也同意。

在我發的資料中，引了劉禹錫〈董氏武陵集序〉中的一段話。劉禹錫講，漢末

建安以下，文學大盛，「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這是說初唐以還，選拔重臣時，文學經常扮演重要的角色，「由篇章以躋貴仕者」，指的大約就是張說、張九齡、宋之間這些人。〈董氏武陵集序〉又說：「兵興以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爲仕，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寢息」。這話似乎有點言過其實，不過至少顯示了安史亂後唐人的一個觀察，感覺這個變亂爲文學的價值帶來了衝擊，文學粉飾太平的功能下降了。這是一般的常識，我今天想提出的另一個看法是，除了安史之亂的衝擊，古文運動的興起——或者廣義地說，中唐文學思想與文學實踐的變化——可能還有更長遠的社會結構性的因素。

在今年八月的第一次座談會，我提到「世變」可分成「突發性的世變」與「結構性的世變」，現在想藉中唐文學的例子談「結構性的世變」。我先要說明一點，古文運動的發韌，可說在安史亂前就開始了，安史亂起的時候，古文運動初期的領導者像蕭穎士、李華、賈至都三十多歲了，思想已經成熟。從這一點來看，古文運動的興起並不能完全由安史之亂得到解釋。現在進入正題，我想講的「結構性世變」是什麼呢？我先講結論，簡單來說，就是出身北方傳統文化的士人因爲唐代政治社會結構的緣故，必須積極參與科舉才能維持他們在政治經濟上的地位，因此大量進入文學社群。表面上看來，這些以經學禮法傳家的士人爲文學所化，但就某種意義來說，他們也改變了文學。換句話說，這是長久以來北方傳統出身的，在永嘉亂後羈留北方，在隋唐以後成爲中國社會上地位最高的一群名門士族，特別是山東士族，他們的成員因爲形勢所逼，進入文學文化裡面。他們本身受到文人文化的影響，甚至造成自身傳統的崩解，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也造成文人風氣的變化。

研究中晚唐思想，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文人，因爲他們是主流，主流不發生變化，其他的變化影響有限。當然，人類歷史上有些變化是從邊緣起來的。不過，爲什麼唐代的文人思想重要，就唐史本身的發展來看，主要是因爲他們在政治權力、文化風氣上，居於主導的地位，這個圈子發生變化，影響力就大了。除了安史之亂等政治環境的影響，中唐文人思想的變化也有內生的因素，粗略地說，是文人的自我批評而產生這個變化的。

在我提出我的具體資料以前，想簡單講一下唐初的文化情勢。從社會史的觀點來看，唐代初期比較上層的士大夫，大概可分成三個群體，一個是與政權接近的關隴集團，這裡面的士人主要是關中、河東、隴西地方豪族士族的漢人，加上附著於這個政權的代北虜姓。後者主要是隨孝文帝遷往洛陽，屬於北魏洛陽文化的，慢慢

華化、儒家化、文學化的北亞民族家庭。另外還有少數的山東寒門，比較低階層的士人，山東士族也有，不過人數較少。這個集團還包括一些郡望原來在關中，在南北朝末期從荆襄一帶回流的士人，他們文化的底層是北方文化，可是受南方詩賦文化影響也不少。這是所謂的關隴集團，從西魏、北周到隋代，因為政治局勢而構成的一個士人集團。

第二個集團是山東士族。山東士族在南北朝時期大部分處於北魏、北齊的治下，到南北朝末期和隋唐時期，山東士族已經是全中國地位最高的社會集團。在文化上，他們是相當保守的，基本上是繼承漢魏的舊傳統。山東士族另有一個特色，在隋朝唐初，他們大體上處於政權之外，可是社會地位最高，在唐初，跟政權有相當緊張的關係。

第三個群體是南方士人。南方的士人集團受到侯景之亂的重大破壞，已經相當離散。後來西魏滅後梁，再加上隋朝滅陳，大量的南方士人被迫北遷，遷到北方後的這一群人基本上已經不成群體了，尤其到了北方的文化政治中心之後，沒有社會根基，可是這群人的地位很高，因為南朝文化在魏晉南北朝是優勢文化，我想這是中國中古史的常識。在政治上，在北方的南方士人大體依附於關隴集團，屬於政治的主流。

以上所談的三個土人群體中，山東文化與盛行於南方的文學風氣接觸最晚，反抗也最深。不僅山東士族如此，寒門也有類似的態度。就唐代文化的大體走向而言，學者認為有南朝化的趨勢。也就是說，南方文化的很多觀念，逐漸成為流行的風尚，文學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唐代到高宗、武曌以後，政權慢慢向社會各方開放，其中一個汲取高級官員的重要管道是科舉，科舉的最高判斷標準則是文學創作，這個標準起源於南北朝，最早的「秀才」科取士就是如此。這些發展顯示，南朝的文化標準基本上成為全國精英文化的標準。

前面提過，初唐時，山東士族大體處於政權之外，高宗末期以後，朝廷大舉吸收關隴集團以外的士人進入政權，山東士族處在穩定的統一帝國中，必須尋找新的權力或地位來源，科舉成為重要的途徑。玄宗朝以後，山東士族大量進入科舉系統，山東士人當中也出現重要的文賦作家。這跟南北朝時的局勢是不一樣的，甚至跟隋朝也不一樣。那時北朝文人只是在北方有名而已，在全國來講，他們只是二、三流的人物，北魏的重要作家如魏收、邢邵都模仿南朝的文風；南朝文士王褒和庾信到了北方，立刻得到公認的最高地位。

現在請看我所提出的資料，「中唐古文運動核心人物與主要贊助者的家族背景」一表：

姓 名	家族背景
蕭穎士	蘭陵蕭氏（北遷之南士）
賈 至	郡望長樂（在今河北），史書稱洛陽人，父祖皆為知名文臣
李 華	趙郡李氏（山東士族）
獨孤及	代北虜姓
李 翰	趙郡李氏（李華族人）
梁 肅	隴西名族（關隴集團）
蕭 存	蘭陵蕭氏（蕭穎士子）
李 舟	隴西李氏（山東士族）
崔祐甫	博陵崔氏（山東士族）
崔元翰	博陵崔氏（山東士族）
李 觀	隴西李氏（山東士族）
韓 愈	較低層之北方（山東）士族
李 翱	隴西李氏（山東士族）
皇甫湜	南方人（原籍睦州新安，寄家揚州）
呂 溫	新興家族（透過科舉興起），北方人，祖塋在洛陽
柳宗元	河東郡姓（關隴集團，曾南遷至淮河流域）
劉禹錫	代北虜姓
總 計：	北方家族—14 山東士族—7，關隴（含河東）舊族—2，代北虜姓—2， 較低層之山東舊族—1，新興家族—1，不詳—1（賈至） 北遷之南方家族—2 南方人—1

上表列舉的人物是有選擇的，主要根據兩個標準。第一是古文運動的主要領導者，第二是支持者，或倡導贊助者，基本上也是文人，我沒有把談論文學問題的局

外人放進去。這份資料中的人可以分為三個世代。第一是安史之亂前後思想、人生經驗達於成熟的一代，像蕭穎士、李華、獨孤及等。其次是安史之亂時年紀還輕，到了德宗時期領風騷的一代，如梁肅、崔祐甫、崔元翰等人。第三代則是在德宗末期、憲宗初年開始出頭，這是中晚唐文學思想發展中最重要的一代，包括李觀、韓愈、柳宗元、李翱等。這份資料雖然只包含少數人，代表性應該很夠，沒有故意把哪一類人遺漏，或故意放進哪些人，以造成某種效果。

我的資料顯示，古文運動的大多數領導者和贊助者都出身北方士族。過去已有學者（如羅聯添先生）指出，古文運動的參與者多是北方人。我的探考似乎比前人具體些，表中的絕大多數人，我們都可以確切地知道他們的家族背景，賈至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但這裡無法細講。大家請看資料表的總計部分，北方家族出身的有十四位，其中地位極高的山東士族有七人。我想提醒一下，隴西李氏的郡望雖然是隴西，卻屬於山東士族，他們是西涼皇室的後裔，在北魏的平城時代加入北魏統治集團，後來在洛陽繁衍發展。除此之外，關隴舊族出身的有兩位，代北虜姓有兩位，韓愈家族則屬於比較低層的山東士族。總括而言，這份資料裡，北方舊文化背景出身的有十二人，其中山東士族是核心。以上所說，是大概的情況，細節就更複雜了，譬如柳宗元的家族在永嘉亂後曾經南遷，但他們居於淮河流域，受南方文化的影響似乎不很深。

資料表中還有兩人屬於北遷的南方家族，他們是蕭穎士和蕭存，這兩人是父子，出身蘭陵蕭氏，是南朝梁的皇室後裔。純粹的南方人只有一位，而且時代比較晚，這是皇甫湜。從這份資料表，我希望顯示中唐文學與世變關係中的一個結構性因素，這個因素從表面上看不太清楚，但長期而言，可能是具有關鍵性的因素，這就是，在唐代的士人文化，根源於南方的文學、文化風氣佔了上風，可是因為它吸收了別的因素，尤其是地位很高的北方士族文化，內部終於產生變化。簡單地說，這裡提出的想法是：武曌、玄宗時代以後被納入科舉系統的北方士族，是中唐文學變化的一個來源。

再來想談一下中唐古文運動中貶抑文學地位的現象。關於古文運動的思想，學者的討論可說是不計其數，個人其實沒有發言的資格，以下所講，主要是為我對中唐文學與北方士族文化之關係的看法，作個補充說明。古文運動揭舉的目標是文章改革，改革有兩個主要方面：一是文章內容與方向的改革，古文運動要求文章以六經為依歸，要表達六經的意旨，有教化的功能，換個說法，就是要求文章能表達、

宣揚文明的基本價值；另外一個方面是文體的改革，文章要從駢變散，不應太注重華辭麗藻，對偶、聲韻的要求須放鬆。除了這兩方面，古文運動似乎對文學本身的價值也有貶抑的趨勢，這個傾向或許和文學陣營中的北方士族因子有關。

關於中唐文學社群中的北方士族因子，我想舉李觀的〈報弟兌書〉為例。李觀出身隴西李氏（家居江東，可能是安史之亂後遷移的），〈報弟兌書〉說：「明經世傳，不可墮也；文貴天成，不可彊也。」很清楚地表示，他們家是以經學傳世，現在文學當道，只能隨緣利用天賦以求成功，但不應拋棄家傳學業。此外，李華屬於趙郡李氏，他的著作顯示，他雖然是文人，但有強烈的儒家舊族意識。

現在簡單追溯古文家對文章的藝術價值的看法。早期古文家的基本思想，也許可以用獨孤及告訴梁肅的話為代表：「荀孟樸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唯子可與共學，當視斯文，庶乎成名。」（梁肅：〈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這段話的意思是，文章要有內容，有興致，而且這個興致基本上要以儒家的教化為依歸，不過文章也要有藝術性，這是美文意識的一面。獨孤及說：「荀孟樸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這兩個極端都不好，賈誼、司馬遷、班固的作品有文有質，是文章家應當效法的對象。在古文運動初期，談到文章的教化功能，一般是說以六經為依歸，是一種相當具體的說法。到了梁肅這一代，開始慢慢有人把文跟「道」相連在一起，不過講得還不是很清楚。到韓愈、柳宗元、呂溫的時代，就講得很明白了，「文以明道」、「文以貫道」的說法出來了。在「文以明道」的意識中，有一個觀點是，文章只是表達「道」的手段，基本上把文章貶抑成工具性的價值。這種看法在呂溫的〈人文化成論〉有比較極端的表現。

呂溫這篇文章對「文」的觀念做了重新的解釋，他把「文」作為文章的意義邊緣化了，說「文」的本義其實不是文章，這是後世的誤解，今天我們應當恢復它的原義，這是對文章的藝術價值一個相當負面的看法。呂溫說：「有聖作則，實為人文。」「文」是什麼？是聖人創造的法則。有哪些內容呢？他舉出五項：「室家之文」、「朝廷之文」、「官司之文」、「刑政之文」、「教化之文」。可是，「近代諂諛之臣，特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裳冕服，章句翰墨，為人文也。」「近代」大概就是指漢晉以下，這段話說：近代的人臣認為君主沒有能力遵循堯舜的典範行事，就把「旂裳冕服」、「章句翰墨」來當人文，這根本是誤解。呂溫出身一個新興家族，靠進士考試、科舉進入了唐代統治

階層，卻好像不顧自己家族的飯碗，向自身地位的基礎挑戰。

類似〈人文化成論〉的觀點還出現見於一篇叫〈文之章解〉的作品。此文的作者是韋籌，他是文宗大和二年（828）的進士科狀元，時代比較晚。〈文之章解〉說，「文」包括了天文、地文、人文。人文就是禮樂，文字叫作「章」，是表達的「文」的工具。文章如果不從禮樂出發，就不是正當的「文」。這也是對「文」的新解，不把美文當作「文」，這是一個進士科狀元講的話。呂溫和韋籌都是從小讀《文選》、背韻書的人，由文學寫作進身，他們的文學理論卻否定文學足以稱為「文」，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

一般比較熟悉的古文運動中貶抑文學的觀點，是把文學當作宣揚「道」的工具。譬如，韓愈在〈上宰相書〉中說：「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他有一篇〈答李翊書〉說，文章是「道」的外衣，是裝飾性的東西。同樣的說法，還見於〈答李秀才書〉。當時古文運動家的普遍思想，認為「道」是本，文章是末。文章為什麼重要？因為它雖然是「末」，卻可藉以探「本」，「本」就是「道」，所以文章雖然是末，具有一定的價值。（參考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

另外一位古文家李翱對文章與「道」的關係，有一個很妙的看法。他在〈寄從弟正辭書〉，把文章當作修道的工具。他說：「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這是說，天生有仁義的人，文章自然好；文筆好，能展現文章真諦的人，我沒有看過他是不盡力於仁義的。因為有天生的仁義之性，而能寫文章的人，稱作「性」；透過文章而習得仁義的人是「習」。這段文字套用《中庸》的誠明說，把文章寫作描繪成修道、探道的工具，與美文的觀念差距非常遠。當然，以上引文並不能代表說這些話的文人的全部思想。不過，我想講的是，中唐文學思想中有一種貶抑文章價值的趨向，一種自我否定的趨向。我們或許可以說，這些人的思考邏輯的下一步就是直接探索「道」。既然「道」這麼重要，為什麼還要在「文」那邊繞？歷史的發展、人的思想並不是跟著邏輯來走的，不過，剛才提出的推論是古文家自己也可以想到的，在他們的著作中，我們的確也看到，直接探究儒家根本原理的企圖在萌生。

我在文哲所舉辦的「世變中的文學世界」第一次座談會討論魏晉南北朝文學價值升降的時候說，魏晉是一個文學價值升的時代，中唐以後則是文學價值降的時代。在唐代，誰開始壓抑文學的價值呢？最早是出身北方士族的非文人，特別是注

重經學、史學的知識分子。這類觀點最先出現於南北朝正史的文學傳（寫於唐太宗、高宗時）。後來如劉知幾、尚衡、柳冕等人，延續了這個傳統。但是，對文學的獨立價值的真正嚴重威脅，是從古文運動的第二代、第三代開始的。這時候，有文壇領袖說，我做的東西不那麼重要，這是一個重大變化的開端。文學寫作經過魏晉南北朝到唐代，成為文化中地位最高的活動，這一點連唐人自己看歷史，都覺得是可驚的事。但從八、九世紀之交開始，至少在理論上，許多文人認為，文章寫作應該為「道」服務，與此同時，經學思想也發生了變化，受到佛教、道教思想影響的理學後來慢慢產生，洶而有新儒家的誕生。到南宋以後，文學的地位就明顯低落了。宋代的理學家動輒指斥唐代的儒家思想家——包括韓愈在內——終究只是文人，這樣的態度，就是韓愈和他的同志自己種的因。以上是我的一些簡單看法，謝謝各位。

衣若芬女士：

謝謝陳弱水先生，我們接下來要由元智大學羅鳳珠女士來為我們介紹她所設計的「唐宋代文史綜合研究資料中心」。如果各位曾經用網際網路來查詢資料，可能上過在台灣蕃薯藤網路資料索引的熱門排行榜前一百名的「網路展書讀」這個網站，「網路展書讀網站」的主持人就是羅鳳珠女士。同時羅鳳珠女士所籌畫設計的「《紅樓夢》網路教學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還榮獲「八十七年中華民國資訊月傑出資訊應用暨產品獎」，我們在這裡恭喜她，並歡迎她繼續為我們開發更多網際網路資料讓學者使用，我們現在就請羅鳳珠女士介紹「唐宋代文史資料綜合研究中心」。

羅鳳珠女士：

在座的各位先進大家好，很抱歉因為我這兩天都在資訊展會場，講太多話所以聲音沙啞。謝謝衣若芬博士的介紹，在座這位是我的學生張如瑩小姐，她是我的助理工程師，這次得獎的「《紅樓夢》網路教學研究資料中心」，她出力最多。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資訊科技帶給文史研究的衝擊，以及我在網際網路建構「唐宋代文史綜合研究資料中心」一些粗淺的想法。我要介紹的資料分為五點，第一個是資訊科技的發展對文史研究的衝擊；第二是以「唐宋代文史綜合研究資料中心」為例的資料庫架構設計；第三是以電腦作為文史研究工具的「能」與「不能」；第四是「唐宋代文史綜合研究資料中心」在文史研究上的應用；第五是文史研究資料

數位化過程中，文史學門的角色扮演。

我記得唐德剛先生於 1998 年曾在報刊發表一篇文章，寫到：當他第一次使用中央研究院的二十五史資料庫檢索資料時，他發覺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感受到資訊科技帶給文史研究工作的便利性，文中還提到胡適先生早期從事考證的工作，常常為了考證一個很小的問題，花很多的時間在蒐集資料上面。唐先生很感慨的說一句：他覺得人才浪費不起，如果我們很多研究人才的時間都花在資料搜尋上面的話，那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1998 年 9 月，聯合報有一場以「資訊與網路」為主題的世紀訪談，由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教授主持，邀請現任校長劉炯朗教授、有「光纖通訊之父」的高錕教授、第一位哈佛「蓋茲講座教授」孔祥重教授，展開一場世紀對話，沈君山教授認為「廿世紀初的物理革命，經過二次世界大戰時軍事應用的洗禮後發展成熟，成為可以致用的科技。因為科技的知識可以累積，科技的力量可以相乘，他就像一列加速行進的列車，對人類的影響愈來愈大，成為改變社會結構人文倫理重要的因素。電腦的發展及應用就是其中最特出的例子。」沈教授還進一步說：「假若我們用深度、廣度和速度三個指標來衡量一項科技發明對社會產生的衝激，即使跨入廿一世紀，在深度方面，生物技術（例如複製生命）無疑最具震撼性，但在廣度和深度方面，至少在近期內資訊科技恐怕還將獨擅勝場。」（《聯合報》，1998 年 9 月 7 日，第 3 版）在文史的領域裡，文史研究大概是應用電腦科技最晚的一個學門，中研院二十五史的資料庫研發到現在已經有十二、三年的歷史，但是與中國整個典籍比較起來，所佔的資料比例還是非常的少，其中文學的典籍更少，文學領域參與這個工作的人也寥寥可數，我覺得這是我們中文學門需要急起直追的地方。

接下來我從整個資料庫的架構來說明我的一些想法，我把這整個資料庫取名「網路展書讀」，除了唐宋文史資料之外，它還包含了其他部分。整個資料庫中，主要分為「善本書——蒙古車王府曲本」，這是和北京大學圖書館合作開發的資料庫，預計在 1999 年年底第一批資料可以上線。另外在韻文部分，已經完成的有「詩經」、「全唐詩」、「宋代名家詩」、「全宋詞」，進行中的有「楚辭」、「漢魏六朝詩」。古典小說方面，最早完成的是「紅樓夢」，預計以相同模式發展明清章回小說。另外還有教學與習作使用的「倚聲填詞」、「依韻入詩」，這是一個做作詩填詞的課程習作中，可以自動批改詩詞創作的系統。

現在我介紹「唐宋文史綜合研究資料中心」，在整個架構當中，我自己的想

法是文學的研究，基本上是離不開史料，詩史可以互證，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在這方面取得很高的研究成果，可惜當時沒有電腦輔助，要不然他一定可以獲得更多的研究成果。我們的資料庫包含《新唐書》及《宋史》資料，這兩部分的資料是我跟中研院史語所以交換方式取得。在原典資料當中我們還有全唐詩、宋名家詩、全宋詞。宋詩資料十倍於全唐詩，三年五載難以竟工，我們目前只蒐集比較重要的文人作品，我們蒐集的原則是每一位選定的作者，其作品都全部輸入。除了這些原有的典籍資料之外，我們希望進一步能夠蒐集的是後人研究論著資料，比如期刊論文資料、會議論文資料、學位論文資料、研究計劃資料、研究專書資料。這些資料的蒐集工作，國內資料的蒐集與國家圖書館合作，大陸及臺灣之外地區的資料與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合作，資料都會持續更新。目前正在建立的資料還有唐宋代的文人傳記資料（國家圖書館協助）、唐宋代歷史地圖資料、唐宋代職官資料、唐宋代帝王譜系資料，將來預計要擴充的還有宋人筆記資料。

以下我逐項說明我做這個系統的一些想法：

（一）、資訊科技的發展對文史研究的衝擊

中國古典文學卷帙繁富，浩如煙海，有此豐富的文化資產，固然可喜，然而如何以更方便有效的工具、方法，去使用、傳承、傳播中國文化的資源，使中國古籍活出現代的風貌，使古聖先賢的智慧結晶仍能為現代人享用，在資訊網路蓬勃發展的今天，牽引中國古籍上網際網路，無疑的是當前最方便有效且刻不容緩的工作。

電腦具有儲存大量資料的能力，也具有超強的記憶、檢索功能，資訊網路快速傳輸資訊的功能，已使傳統以紙本存放於圖書館的典籍，變成以數位資訊存放於電腦，可於網路上來去自如，圖書館也變成無紙無牆的數位圖書館，傳統以人力檢索查詢資料的工作，也改由電腦取代，而且效率增加千萬倍。

唐宋代在經濟繁榮的基礎上，文化也得到高度的繁榮，舉凡文學、哲學、史學、藝術等，均有高度的成就，堪稱中國文學史上最輝煌的朝代。文學研究離不開史學資料，史料的蒐集考證工作，也可以從文學作品中尋求佐證參照的資料。

在國際學術網路上建立一個：「唐宋代文史綜合研究資料中心」，讓從事唐宋代文史研究的人，從這個資料中心可以取得唐宋代文史原著典籍資料以及後人相關研究之論著資料，就如同建立一個專題圖書館一樣，完整的蒐集與「唐宋代文史研究」相關的所有資料，讓從事唐宋代文史研究的人，到這個資料中心即可取得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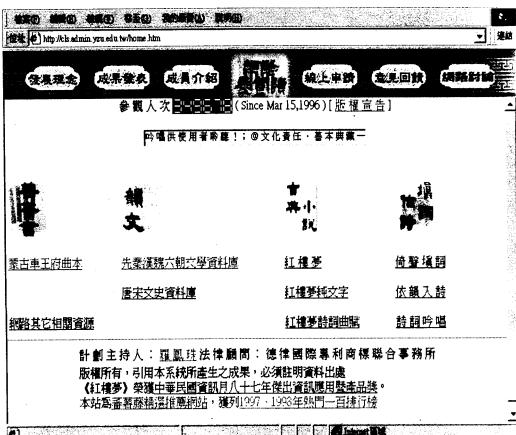
相關資料，不必往來奔走於各個圖書館或各個不同的資料庫。在這個資料庫建構一個可以「多元整合、交互參照」的全文檢索系統，每一種資料可以單獨成為一個資料庫，不同資料庫可以透過適當的系統設計，提供跨資料庫多元組合的方式檢索，如此當可以提供給使用者更多元化的研究與教學使用需求。多種資料庫結合的系統設計，對學術研究的效益，數倍於單一資料庫。謝清俊教授曾對整合型資料庫與單一型資料庫有過一個比喻：「就如一張藏寶圖，劃分成四份時，每一張的價值小於四分之一，合而為一時，每一張的價值大於一，甚至於增加千百倍」。

研究論著資料需隨著新增資料的增加不斷更新，原著典籍資料也可能因漏收或因文物出土而增加。傳統資料庫的作法往往無法提供隨時更新資料的空間，功能的設計也只能提供使用者從資料庫中單向取得所需資料，從人性化的角度來看，並不能完全符合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因此，如何從使用者需求的角度，以「使用方便」為導向，兼顧「管理方便」的原則，設計一個多向、靈活、人性化的網路資料系統，並建立一個可供個人蒐集、儲存、整理、編纂資料的個人工作平台，使用者從資料庫取得符合個人研究需要的資料，或者是資料庫漏收、未收的資料，使用者可以自己建立在系統所提供的個人工作平台上，在這個個人工作平台上進行研究工作，讓系統功能對個別使用者的侷限降到最低。除此之外，提供一個資源共享的空間，使用者有新增資料時可以回饋到資料庫，資料庫的更新可以從管理者擴充到每一個使用者，是這個整合型資料庫的終極目標與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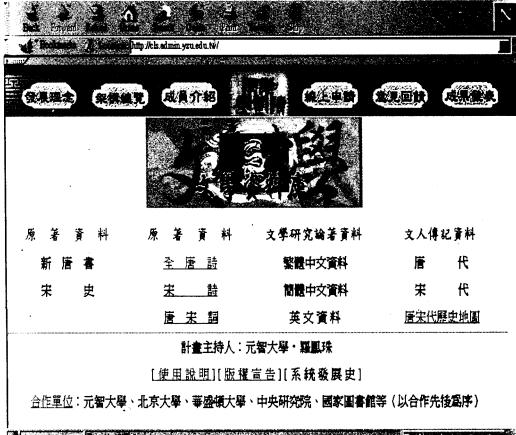
教學也是文化傳承過程中重要的一環，好的教學建立在好的研究基礎之上。持續不斷的研究是教學不可或缺的要件，傳統的教學活動在課堂之中，有時間及空間的限制，網際網路具有可以儲存及傳輸文字、影像、聲音、圖形的特質，正好提供一個可以在網路上模擬課堂教學的工具，而且也可以突破傳統教學時空的限制，網路上的遠距離教學，使教學活動突破了時間、空間的藩籬。建立一個網路教學討論區，使研究與教學緊密結合，也是這個系統設計的主要著眼點。

（二）、以「唐宋代文史綜合研究資料中心」為例的資料庫架構設計

本資料中心為「網路展書讀——中國文學網路系統」之子系統（圖一），系統名稱訂為：「唐宋代文史綜合研究資料中心」（圖二）。



圖一：網路展書讀——中國文學網路系統



圖二：唐宋文史綜合研究資料中心

今分別就資料蒐集範圍與系統功能介紹如下：

一、資料蒐集範圍

本資料庫預計蒐集參類資料。其一為詩、詞、文、史原著典籍資料；其二為周邊研究資料；其三為後人研究論著資料。

(一) 詞、詩、文史原著典籍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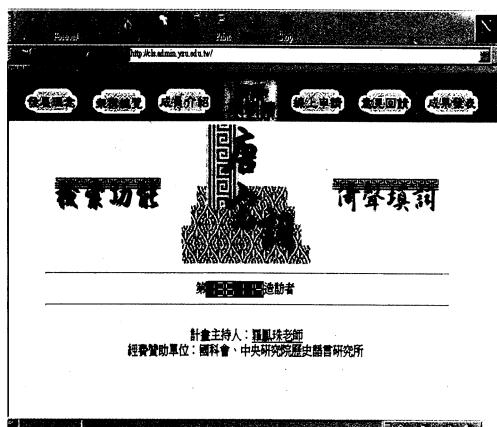
- 在詞的方面：詞在晚唐、五代萌芽之後，經過宋代文人的努力，詞成了兩宋的代表文學，本資料庫內含全部唐宋詞。（圖三）
- 在詩的方面：宋詩承光芒萬丈的唐詩之後，於內容上另闢蹊徑，宋詩的成就，較之唐詩，不遑多讓，宋詩的數量更十倍於唐詩，本資料庫內含全部唐宋詩。（圖四、五）
- 在文的方面：唐代韓愈提倡古文運動之後，歐陽修在古文方面的成就與影響，及於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等人，與韓愈、柳宗元並列唐宋八大家，本資料庫預計蒐集全部唐宋文資料。
- 在史的方面：本資料內含《新唐書》與《宋史》資料。

(二) 周邊研究資料

- 筆記小說資料
- 唐宋帝王譜系資料
- 唐宋代職官表資料
- 唐宋代文人傳記資料：作者生平與作品的關係密不可分，本資料庫擬建立

唐宋文人傳記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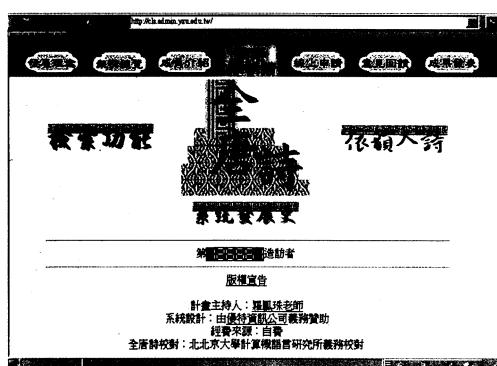
5. 唐宋地名資料：文史資料內容包含很多專有名詞，本資料庫擬先建立唐宋地名資料。
 6. 唐宋歷史地圖資料：從歷史地圖可以充分掌握唐宋版圖的變化、唐宋地理各個地理位置的資料。（圖六）
- (三)後人研究論著資料：預計蒐集研究論著、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會議論文、研究計畫等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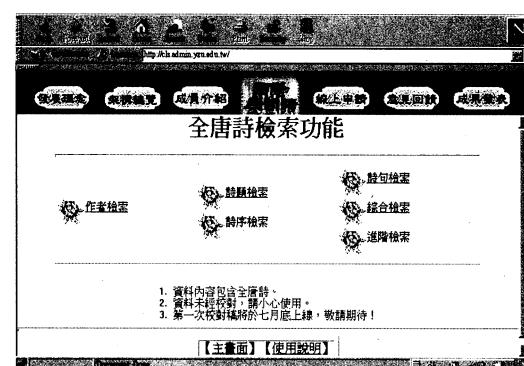
圖三之一：唐宋詞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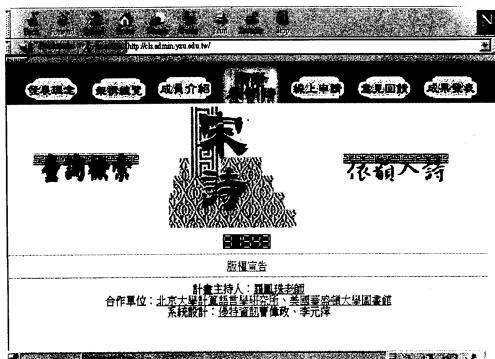
圖三之二：唐宋詞資料庫檢索畫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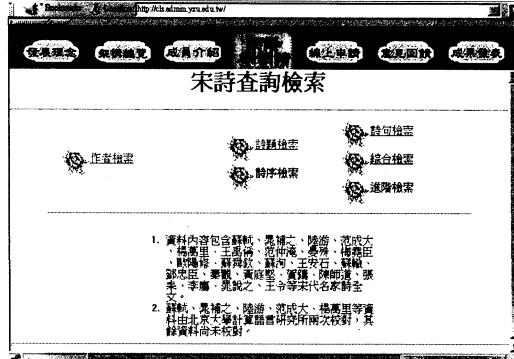
圖四之一：全唐詩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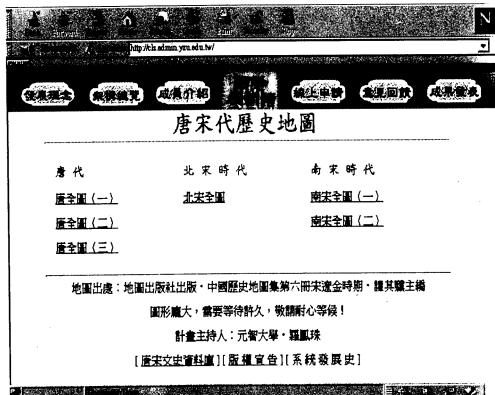
圖四之二：全唐詩資料庫檢索畫面



圖五之一：宋名家詩資料庫



圖五之二：宋名家詩資料庫檢索畫面



圖六之一：唐宋代歷史地圖首頁



圖六之二：唐代歷史地圖（可自由伸縮）

二、系統檢索功能（以宋詩為例）

(→共同性檢索功能：

1. 具布林檢索功能（AND、OR、NOT）
2. 具模糊檢索功能
3. 可以選擇一種以上檢索點檢索，例如：無論是選擇以詩題、詩序、詩句為檢索點，都可以指定以全資料庫為檢索範圍或以某些作家（一個以上）為檢索範圍。即檢索條件可以從作者、詩題、詩序、詩句等自由選擇一種以上進行檢索。
4. 檢索詩文內容時，無論以關鍵字、關鍵詞、模糊句、詩句檢索，檢索結果

都會列出：作者、詩題、詩句三項基本資料，不須列出詩序及詩體，但若該首詩含有詩序，可以提醒使用者「內含詩序」，由使用者選擇是否要叫出詩序。詩體也由使用者自由選擇是否列出。詩句的列出方式為：每筆查詢點列出二句詩句，二句的分法以偶數句為截斷點，使用者可以進一步要求系統列出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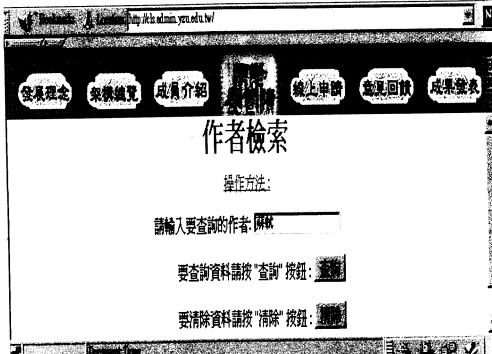
(二)個別性檢索功能：

1. 作者：可輸入作者本名、別名、字、號檢索。（圖七）
2. 詩體：可選擇全部詩體，或只選擇某一類詩體，如只檢索五律、七律、五絕、七絕。
3. 詩題：可以輸入關鍵字、關鍵詞、全句、模糊句檢索。
4. 詩序：可以輸入關鍵字、關鍵詞檢索（不用模糊句及全句檢索是因為使用者不可能記得全文）。
5. 詩文：檢索結果可以指定列出一句或二句。關鍵字詞檢索：可以選擇「特定關鍵字」或「任意關鍵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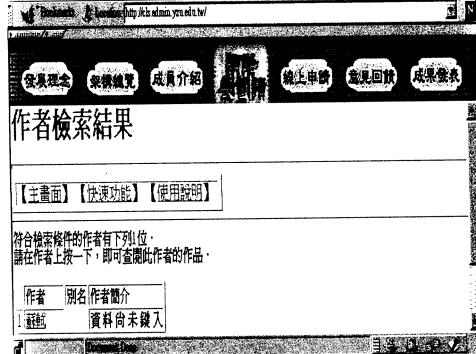
說明：

- (1)以關鍵字詞檢索時，若選擇布林檢索功能，搜尋對象可以選擇五種方式：
 - 只限於出現在同一句者。
 - 只限於出現在同一聯者：若檢索範圍限定在律詩，可以指定出現在頷聯（三、四句）、頸聯（五、六句）的句子。
 - 以全詩為範圍。
 - 只限於出現在韻腳者。
 - 只限於出現在字首者。
- (2)以關鍵字檢索時，不選擇布林檢索功能，搜尋對象可以選擇四種方式：
 - 只限於出現在某一聯者。
 - 只限於出現在字首者。
 - 只限於出現在韻腳者。
 - 以全詩為範圍。
- (3)進階檢索說明：若檢索不到時：系統自動到同音字、古今字資料庫檢查同音字、古今字、異體字、生僻字，列出可能的詩句。
- (4)綜合檢索：可以同時輸入作者、詩題、詩句三個檢索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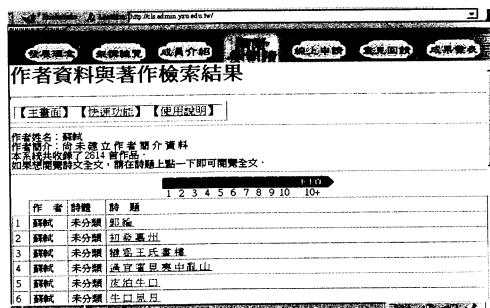
(5)詩句檢索說明：主要功能是檢索某些詩句的出處，若檢索不到時：提醒使用者改用進階檢索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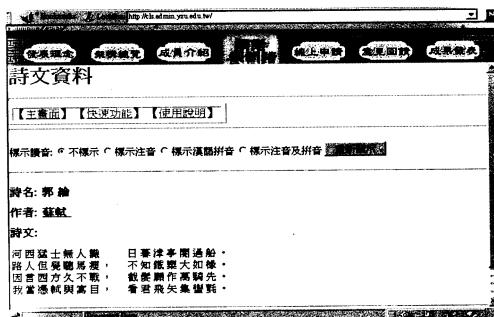
圖七之一：以作者為檢索點（輸入蘇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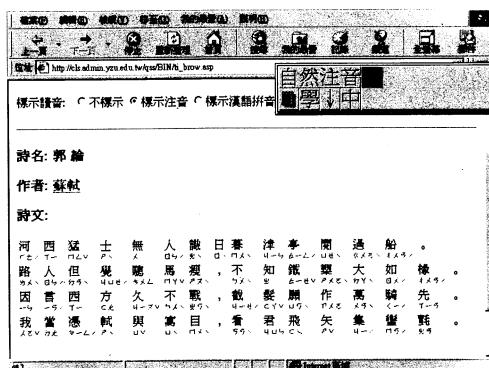
圖七之二：資料庫內之蘇軾計有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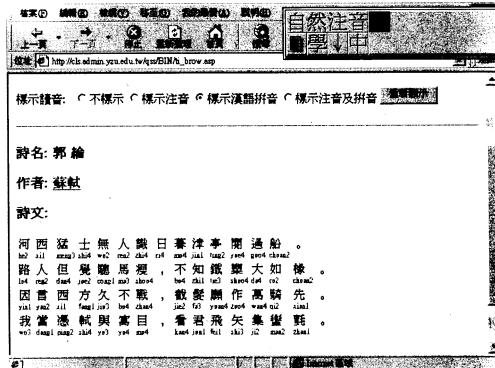
圖七之三：檢索出蘇軾的作品目錄



圖七之四：作品全文



圖七之五：標示讀音--注音符號



圖七之六：標示讀音--漢語拼音符號

（三）、以電腦作為文史研究工具的「能」與「不能」

電腦超強的記憶、分析、歸納、運算能力，遠非人力可及，以之應用於自然學科的研究，是絕佳的輔助工具。然而，文學不同於其他學科，文學永遠有多樣的風貌，「橫看成嶺側成峰」是文學作品的迷人之處。在電腦不具備思維能力，沒有情感之前，電腦檢索、分析、歸納等「理性的功能」，不能滿足文學「感性的需求」，文學有更多的情意，更多的想像在內。欣賞文學作品過程中衍生的心靈思維與情意感發，電腦無法取代。文學含有無限的、抽象的想像空間，而電腦現階段的功能，在文學研究上能提供的是有限的、具象的資料呈現。以引用電腦作為作詩填詞輔助工具為例^①，電腦能快速準確的修改格律不合的詩詞，使之成為「格律正確的作品」，卻不能把不好的作品改成好的作品。

文史學界從文史專業的角度，引導文史數位化的方向，讓電腦科技為文史研究作更好的服務，使電腦的功能更符合文史研究的特性與需求，除了需要文史學門提出「需要什麼？」由電腦科技學門協助「如何滿足需要？」^②之外，還需仰賴文史學門將平面的文史資料加上必要的標注，藉著知識結構的改變，研究工具的改變，產生新的研究方法，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必能產生新的研究成果。處理單一規則的訊息，檢索單元的資料，對電腦科技而言，已經有非常成熟的技術。如何在電腦「能」作的與「不能」作的中間，尋找一條突破的管道，使電腦更具有人工智慧，讓電腦科技與人文研究作最好的結合，這條從「不能」到「能」的過程，對於資訊界與人文界雙方而言，無疑的，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四）、「唐宋代文史綜合研究資料中心」在文史研究上的應用

1. 利用人物傳記資料作人名考、交遊考研究。
2. 利用唐宋地名資料庫作唐宋文化活動研究。
3. 建立全唐詩、全宋詩、唐宋詞、唐文、宋文……等專題詞彙資料庫作詞彙學

^① 參見羅鳳珠：〈古典詩詞教學與習作的新嘗試——網路作詩填詞系統，兼及其可行性與侷限性〉，《教學媒體與科技》第36期（1997年12月15日），頁2-11。

^② 參見羅鳳珠：〈在網際網路建立漢學研究環境的重要性及可行性——就中國文學而論〉，《漢學研究通訊》第16卷第1期（1997年2月），頁3-9。

研究。

4. 從詞彙資料中標示同義字詞，擴充為語意學研究。
5. 從詞彙資料中標示詞性，擴充為語法研究。
6. 從韻腳押韻標示工作中作聲韻學研究。
7. 從多元資料交互參照查詢中，擴大研究領域與範圍，將以傳統人力不可能做的研究，輔以電腦龐大的搜尋檢索功能，協助研究資料的分析、歸納、整理，完成研究工作。
8. 從字形、字音、字義的標示工作中，進行斷代語言學研究工作。

（五）、文史研究資料數位化過程中，文史學門的角色扮演

自 1980 年陳炳藻教授在周策縱教授指導下，以電腦作為《紅樓夢》數理統計的工具，寫成〈從字彙上的統計論《紅樓夢》的作者問題〉開始，引用電腦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輔助工具，已將近二十年歷史。從中研院研發《食貨志》開始，中國古籍數位化的工作，也有十多年的歷史。二十年來，電腦科技的進步，與二十年前比起來，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引用電腦作為文學研究的工具，以電子數位資訊保存中國典籍，藉著資訊網路傳播中國文化，是當前文史學界責無旁貸的使命。網際網路發展之初，我們期待著牽引中國典籍搭上資訊高速公路的便車，然而，經過了多年的演變，在資訊科技與人文的結合過程中，資訊科技需要有更多的人文關懷，人文學者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以實際行動參與資訊網路的發展。

中國典籍數量太多，古籍自動化的過程需要集合多數人的力量，古籍自動化的方式需要由文史學界主導，與資訊學界作跨領域的合作，電腦做得比人好的部份，人不必代勞，人該做的是如何讓電腦為人做更好的服務，如何利用電腦這個「新工具」，產生「新的研究方法」，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得到更好的研究成果，讓工具為「人」所用，「人」不被工具限制。資訊學界與人文學界跨領域的密切合作，能讓人文的資訊化與資訊應用帶到一個新的境界，為雙方創造雙贏的局面。

衣若芬女士：

謝謝羅鳳珠女士為我們介紹這資料庫的使用方法，及建立資料庫的種種問題。聽完兩位引言人的發言之後，我想在場的各位專家應該有一些意見要提出來，我們

先休息十五分鐘再來進行我們的討論。

衣若芬女士：

接下來進行我們今天的討論，剛剛我跟陳弱水先生交換意見，事實上本院史語所很早就開始推動電子文獻漢籍資料庫的建立，而陳弱水先生曾經有三年的時間在史語所擔任建立漢籍資料庫的工作，待會兒陳弱水先生會對史語所建立漢籍資料庫這方面的工作做一些補充。同時我們也希望將來史語所跟元智大學有很多合作的機會，建立資料庫讓世人來共享，這樣對於我們學術研究上會有更大的便利。另外今天討論的議題，雖然是截然不同的取向，但是這樣的安排讓我們從更可以兩種不同的研究徑路來思索在唐宋文學研究上有哪些更多的可能。接下來請各位發表意見。

張健先生（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兩位先生的發言雖然各只有半小時，不過卻都充分的運用了這半小時，沒有多餘的言論，我很佩服。不過也正因為只有半小時，所以時間就不夠用，有些論點就交代得不夠清楚。我先請教陳先生一些問題，可能就是因為時間不夠用，所以你沒有辦法全部交代。第一，古文運動你舉了十七位，重要的古文運動核心人物大概都在名單上，但是你在引文資料有列柳冕，為什麼在贊助者的家族背景資料中漏了柳冕？是柳冕的資料不好找嗎？同時蕭存、李舟、崔元翰、崔祐甫這些人應該算是贊助者吧！在贊助者的選擇上是不是有什麼原則或偶然性？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賈至的問題，他既然是洛陽人，父祖皆為知名文臣，為什麼他的家族情況不詳？另外一個問題是皇甫湜，他寄家揚州，我想請教一下，中唐人的觀念，揚州是算標準的南方？還是介乎二者之間呢？另外有一點，你說山東士族在政權之外大體上是比較保守的，但是他們又大量去考科舉，這二者之間你如何詮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關於你的參考資料，我很佩服你下了這些功夫，但是我們就韓愈、柳宗元來講，你的取材稍微有些局部化和偶然性，因為這兩位大文豪，在文學批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他們常常在文章裡面講很多的問題，有時會有互相矛盾的地方，連朱熹也難免如此，你引文中所舉的韓愈跟柳宗元的三條觀點，是貶抑文學的價值，但是他們有多文獻是正面肯定文學的價值而沒有貶抑的意涵，你的引文是一起處理這些觀點，如果沒有特別注意，可能不覺得有問題，但是這些地方可能更值得更深入的去探討，因為一個人不同的文章，不同發言所說的話，其意涵可能就不太一樣，

這可能值得稍微注意一下。謝謝！另外一位，羅女士所提出的論文我非常感興趣，我有一些問題想請教羅小姐。第一個問題是你的資料庫宋詩是以大家為輸入單位？請問你現在已輸入多少人？

羅鳳珠女士：

二十三家，共計約四百萬字。

張健先生：

大家之外，比較小的詩人到什麼人為止？

羅鳳珠女士：

在我論文的第七頁裡面將輸入的名單列在上面，截至目前為止，我們輸入的作家有蘇軾、晁補之、陸游、范成大、楊萬里、王禹偁、范仲淹、晏殊、梅堯臣、歐陽修、蘇舜欽、蘇洵、王安石、蘇轍、鄧忠臣、秦觀、黃庭堅、賀鑄、陳師道、張耒、李廌、晁說之、王令等二十三家。

張健先生：

抱歉，我沒看到。另外我再請教一個問題，美國有兩、三位學者分析《紅樓夢》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的語彙及其出現頻率幾乎完全一樣，所以可以此為確證是同一個作者，這可以說是定論。在你的《紅樓夢》資料庫裡面有沒有這資料？

羅鳳珠女士：

在我們的「《紅樓夢》網路教學研究資料中心」之「研究論著資料」項下可以查到這些資料，會後我可以將資料給您。在拙著〈在網際網路建立漢學研究環境的重要性及可行性——就中國文學而論〉（刊載於《漢學研究通訊》第16卷第1期〔1997年2月〕），文內有詳細的論述。

張健先生：

這可以說是一個定論，但是現在還有很多人咬定前八十回、後四十回不是同一個作者所寫的。牟宗三先生雖是一位哲學家，但是智慧高，對不同的研究領域仍舊

可以溝通，二十多年前根本還沒有這些研究資料，他就說：我讀《紅樓夢》，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我覺得絕對是出於一手，天衣無縫。我覺得非常佩服，當時還沒有這些研究資料。林語堂先生年輕時候都說《紅樓夢》前後的作者是不同的，但是在晚年的時候突然寫一篇文章說：現在他認為是同一個人。當時我們還以為他一時糊塗。可見這些有智慧有學問的前輩，還是有他們高明的地方。現在有這些研究成果來證明，這都是電腦的恩賜。當然後四十回是經過程、高二人修補的，不然不會有這種情況。他們蒐集原稿之後，發現稿子不完全，不得不修補，不過修補的比例非常低，所以對整個語彙的影響應該是微乎其微，很高興今天有這樣的收穫，謝謝！

陳弱水先生：

謝謝張先生的指教和問題。我今天提出來的，是一些粗略的研究資料，還未寫成論文，希望將來能寫出來。我現在一一回答張先生的問題。關於我沒有將柳冕放在「古文運動核心人物與贊助者的家族背景」表中的原因。第一是柳冕跟古文運動的提倡者沒有什麼聯繫，是不同圈子的人。他是柳芳的兒子，是文士圈外人，與禮學、史學這方面比較接近。第二，我想談的問題是文人思想的變化，照唐人的標準，柳冕恐怕算不上是文士。他自己一再強調，他對文章創作有看法，但自己沒辦法在創作實踐上做到。原因很簡單，他不是文章家。基於以上兩點理由，我考慮很久之後，認定他的看法基本上屬於文壇外人的觀點，而非文學創作者對文學的省思，這個傳統從劉知幾追溯到唐初都有，並不是始於古文運動。我的判斷或許還須斟酌，不過我是經過思慮的。剛才因為報告時間倉促，沒能說明這一點。

張健先生：

您是史學家，所以考慮的方向和我們文學工作者不同。不過每一部文學史，講到古文運動都會提到柳冕，這一點或許可以提供你做參考。

陳弱水先生：

謝謝張先生。從我的角度來看，柳冕的作品是一個非文人的文論，所以沒將他放進表中，他當然可以算是廣義的古文運動的一部份。不過，現在歷史研究相當重視社群的問題，我研究唐代的思想，希望能對相關人物作社群區分，然後來看思想與時代的關係。至於為什麼沒有賈至的家族背景資料？這就比較難講。一般來說，

我們要知道一個唐人比較明確的家族背景，如果是上層社會出身的，最好要有根據族譜撰寫的墓誌銘或正史傳記資料，另一項重要資料是《新唐書》的〈宰相世系表〉，可是〈宰相世系表〉有個問題，就是只列舉曾經出過宰相的家族（韓愈家例外），涵蓋面有限，如果某人沒有墓誌銘或詳細的自述傳世，正史傳記簡略，家族也未出現於〈宰相世系表〉，就不易得知他的家族背景。以賈至而言，他的祖父是賈言忠，父親是賈曾，這兩人的傳記資料都不清楚，家族背景就不得而知。當然，我們還可以查唐代氏族譜，看看長樂賈氏的地位如何，但這種資料不夠精確，很難判斷某一家族在唐代的具體處境。至於古文運動贊助者名單的標準，我是取贊助者中與領導者關係密切的，譬如古文運動重要人物的文章曾提到的贊同他們觀點的人，以李舟為例，李舟的傳世作品只有文章寥寥數篇，看起來不重要，但李舟的父親李岑是蕭穎士、賈至、獨孤及的朋友，而且曾對李舟灌輸古文思想。我剛才沒有提，古文運動中有世家的現象，就是某些人有特殊的文學思想，然後傳弟傳子傳孫，形成古文運動家族，李舟家似乎就是如此，所以我把他放到贊助者的名單，可是我沒有把父子都放入，因為他們雖然都是贊助者，但並非重要人物，如果兩個都放上去，可能比例失衡。張先生還問：為什麼山東士族在政權之外，又大量去考科舉，這一點我剛剛沒講清楚，山東士族大體上不屬於關隴集團，但是在隋朝唐初並沒有一個方便的管道，能讓與統治集團沒有密切聯繫的文儒世家進入政權，科舉制度成立之後，有科考這個門路，山東士族才得以大量透過科舉，進入政權。我講山東士族在政權之外，是指隋朝和唐初。山東士族大舉進入政權，主要是唐玄宗之後的發展。關於揚州的問題，照一般的說法，揚州還是屬於南方，往北到淮河流域，山東南部、江蘇北部、皖北一帶，這在南北朝時是南北疆域不斷變換的地方，算是南北文化混雜區。

張健先生：

我想這不只是唐朝的問題，因為揚州南部的話跟山東的南部的話非常接近，所以才有這個疑問。

陳弱水先生：

對，現在揚州話屬於官話系統。不過中國中古的歷史人文地理，南北基本上是以淮河劃分，而不是如後來以長江為界。剛剛衣教授要我談史語所的漢籍資料庫。

我很佩服羅女士所建立的資料庫，我覺得這已經不是資料庫了，已經往工作站的方向走，可以在上面作研究，不只是去查資料而已。我對這方面是外行，個人直覺以為，資料庫的功能要提升，工具書的數位化很重要，如果辭典、典故辭典、生卒年表、地名辭典、傳記資料索引能與文獻資料庫聯結，研究在電腦上就可以做了。當然，工具書的數位化，涉及版權的取得，在軟體方面，可能也要重新做設計。我主張工具書的數位化，首先就是做辭源、典故辭典，如果把唐詩宋詞典故辭典和文學資料庫聯結，對研究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幫助，這是我的一個想法。關於史語所資料庫的工作，我剛剛跟羅女士說過，我們正在製作《全唐文》資料庫，史語所的計畫的最大優點就是工作能量比較大。我們沒有輸入《全唐詩》，因為羅女士已經做了，將來可以交換，這是非常好的。事實上中研院有更大的計劃，叫做《新四庫全書》，這一點李豐楙先生也知道，其實是一個漢籍全文計劃，希望把近代以前的全部漢籍，包括傳統上不重視的宗教典籍、民俗文獻等全部輸入，這個計劃很大，所以將來資料庫的來源不是問題，而是如何發展互相合作的機制，譬如《全宋文》資料庫的建立，《全宋文》是新出版品，是四川大學所作，不能自行拿來輸入，必須先建立合作關係。至於史語所同仁提供的書目，我很久沒上羅女士的資料庫，不知道她的資料庫是否有這些書目。據我所知，史語所同仁提供的書目，缺點非常多，因為唐史書目就是我自己提供的，這份書目原先是手寫的，請助理輸入，錯字很多，沒有經過仔細的校正，期刊的期數、年代，錯誤恐怕也不少。所以請各位在使用時多包涵，一定要再作查核工作。這套書目不是我們所的計劃，而是本所劉錚雲先生自願發心來製作的，個別同仁捐獻自己的資料，品質較不整齊。

羅鳳珠女士：

高本漢先生在 1952 年用數理語言學的方法來作《紅樓夢》的研究，他挑出三十八個字比對，認為前八十回跟後四十回的作者是同一個人。1970 年趙岡先生用經濟學上數理統計的方法推翻了這個結論，認為前八十回跟後四十回的作者不是同一個人。到了 1980 年陳炳藻先生用電腦的統計方法研究，認為是同一個人。之後陳大庚先生跟李賢平先生又推翻了這個說法。前後四次的研究，高本漢、趙岡二位先生用人工概算統計，陳炳藻、陳大庚、李賢平以電腦輔助，各得出兩個不同的結果。陳炳藻教授現在在香港教育學院主持中文系，我九月份應邀到他們學校主持一個星期的卓越計劃講座，當時我就請教他：他在 1980 年就利用電腦來作統計，現

在電腦發展到這種地步，他有什麼感想？他說：十九年前的電腦，如果具備現在的功能，他相信他可以做得更好，可以節省很多時間。他告訴我當時他花了多少時間，做了多少卡片，言下之意有生錯時代的感慨。而我個人認為，若以今天的電腦科技，加上更多的樣本，應該可以再作更精密的分析，無論結果如何，結論當可具有更高的說服力。陳炳藻先生引用電腦作《紅樓夢》的研究，為《紅樓夢》的研究工作建立一個新的方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隨後 1983 年，鎮江科技中心彭崑崙先生在參與該中心與南京工學院聯合研製「《紅樓夢》數據庫系統」過程中，用電腦加上數理統計方法去計算《紅樓夢》裡面各個角色的年齡，寫成論文發表於 1983 年 11 月在南京舉辦的《紅樓夢》研討會；1986 年彭崑崙再以電腦計算怡紅夜宴圖座位的排序，寫成〈還「怡紅夜宴」的本來面目—兼論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交叉研究的意義〉，發表於 1986 年哈爾濱國際《紅樓夢》研討會；1994 年施鐵民教授以〈紅學為體電腦為用—從《紅樓夢》的意象談起〉為題，發表於「與世界對話—甲戌年世界紅學會議」，以上是電腦用在《紅樓夢》研究上的歷程。

我最近在做一個工作，跟北京大學計算語言所合作，把《全唐詩》跟宋詩的詞彙擷取出來，然後比對《全唐詩》用過哪些詞，宋詩用過哪些詞？大家可能都想不到，如果以字來講，統計《全唐詩》的字頻，使用最多的是「不要」的「不」字，而使用頻率最高的詞是「不知」。至於宋詩四百多萬字的排序當中，使用最多的字也是「不要」的「不」字，而使用頻率最高的詞也是「不知」這個詞。另外舉一個有趣的例子，我們一般都認為宋詞比較偏向描寫風花雪月，以為這類的詞會比較多，結果《全宋詞》中使用最多的字是「人」。而「人」字在唐詩跟宋詩的排序之中位居第二位。我會提到這件事，是因為我最近正在做一個工作，就是把唐詩跟宋詩的詞彙整理出來，我們先用電腦去整理，然後再用人工檢查，希望整理出唐詩與宋詩的詞彙資料。

詩詞以雙字詞的數量較多，我們以電腦抽取雙字詞，抽取詞彙的第一個步驟是把兩個字連續同時出現，頻率超過三次以上，就把它當作一個詞，產生一個詞庫。第二個步驟是利用詩詞的句法，比如說七言詩的句法若是 2221 或 223，我們便用電腦程式在這個位置截斷，產生二字詞詞庫。第三個步驟是標示讀音，把雙聲詞、疊韻詞、連綿詞、同聲詞抽出，成為一個詞庫。第四個步驟是利用韻腳自動過濾出律詩，再利用律詩中間兩聯對仗的原則，如果雙聲詞出現在上聯，下聯相對應的位置應該也是詞。最後將四個步驟產生的詞庫互相比對，完全一樣的部份挑出來，成

為一個詞庫，最後再以人工過濾。

建立了這些詞彙資料庫之後，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那些詞彙在唐詩中使用，在宋詩卻不使用，或者是唐詩沒有而宋詩有，有些詞彙蘇軾常用，陸游不常用，這些可以做為詩詞風格的研究，或是進一步作語法、語意的研究，這些研究工作我覺得都需要文史學者的加入。文言文詞彙資料的整理，是中國古籍數位化工作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無法細說。我今天到這裡做這個報告，非常希望文史學界能有更多人參與這個工作，因為個人的能力、學識和時間都很有限，而要做的工作太多。

剛才有一位朋友問我是不是會大量的建資料庫，我不傾向大量的建資料庫，建立大量資料需要經費輸入，經費的取得實在是太困難了，我沒有多餘的心力去找經費，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校對，所以我不再大量的建立資料庫，而會朝向探討如何利用電腦開發人文研究的方向，也就是讓電腦經過人工的標示、分析，使它更具備人工智能，這個人工智慧包含它能夠認得異體字的關係、同義詞的關係，這個詞跟這個詞是同義，這個字有多少讀音，不同讀音的不同字義，使它更接近人腦。剛才陳弱水先生提到建立工具書所涉及的版權問題，我深有同感，古籍數位化的過程中，版權是一個問題。我在六年前為了作《紅樓夢》多媒體系統，隻身到北京談版權，那次的經驗回想起來很可怕。我為了取得北京中央電視台《紅樓夢》連續劇的版權，寫信給參與製作的紅學界學者，來接我的是中國藝術研究所的胡小偉先生，我原來並不認識他，見到他時我嚇一跳，胡先生身材高大，還留著絡腮鬍，像個綠林大盜，他陪我跟北京中央電視台談，但是版稅太高，我不可能支付，但是又不死心，跟他們磨到傍晚，他們請我吃飯。他們帶我走進一個胡同，那個胡同越走越暗，面對兩位陌生的男性，而我大概只到他們的肩膀那麼高，我心裡很害怕，我出國都會帶瑞士刀當水果刀，我就偷偷的把我皮包裡的瑞士刀拿出來放在口袋裡面，然後手放在口袋裡面跟他們去吃飯。我希望說服他們，用比較便宜的價錢購買版權，可惜最後沒有談成。後來我跟胡小偉教授比較熟了之後，我就跟他說：我當時手上帶了一把瑞士刀。他就問我：如果我當時攻擊你，你敢反擊嗎？我說：不敢。所以這是一個很辛苦的經驗。在建立這些工具書當中，事實上已經出版的工具書都有版權，版權應該被尊重，我贊成陳教授合作開發的想法。中文全文檢索的技術已經發展成熟了，資訊應用在各領域也普及了，用來查檢資料的工具書改出電子本會比紙本方便得多，使用效益也會大得多，香港中文大學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好，

他們把很多的古籍都製作成光碟，委託香港商務印書館發行，發行的利潤再回歸製作更多的光碟，《漢語大詞典》光碟版也將在近期問世，我相信這些會是很好的開端。

工具書的編纂，往往要耗費很多的人力物力去蒐集編纂，在古籍數位資料累積到一定的數量之後，電腦可以提昇工具書編纂工作的正確性與完整性。例如編纂《全唐詩》典故辭典，若將《全唐詩》的詞彙資料與其他典籍資料做跨資料庫的查詢檢索，可以找到更完整的典故出處，甚至於典故用法的變化都有跡可尋。我最近有一個想法，如果我們很難取得工具書的版權，或者版權費用很貴，我們可以自己重新建立典故辭典等工具書，而且我這邊建立的資料庫跟中研院的資料庫結合起來，事實上有很多的典故可以查得到，或者很多的典故出處會比現有的典故辭典更清楚、更完整，何妨我們自己建立一個新的典故辭典，我覺得會比用人工編纂的要來得完整。

在海峽兩岸三地古籍數位化研發工作方面，上一次的座談會，黃寬重先生認為台灣在這方面的優勢，可能只能維持個四、五年，我倒沒有那麼樂觀，我覺得會更短。更短的原因是環境的因素，以北京大學來說，北京大學的中文系與計算機系合辦一個計算機語言學研究所，結合中文與計算機兩方面的師資，共同培育跨領域的人才，進行研發的工作，四、五年來已經有很好的成績，該所俞士汶教授等編著的《現代漢語語法信息詞典詳解》（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於1998年4月出版後，獲得學術界極高的評價。北京師範大學的漢字研究所也是有計畫的結合兩方面的人才，該所博士班每年錄取二名資訊背景的學生及數名中文背景的學生，目的就是為了要發展古籍自動化。香港中文大學也是這麼做，可是在台灣，這兩方面人才合作的機會很少，我覺得非常可惜。台灣在古籍數位化的觀念上、經費上、基礎上都比大陸好，如果我們能急起直追，應該會有很好的遠景。剛剛陳先生提到《新四庫全書》資料庫，我兩個禮拜前（1998年11月）才從北京回來，大陸發行了很多套電子版《四庫全書》，《四庫全書》有七億字，數量非常龐大，出版社為了商業的先機，講求快速上市，作法上很難周全，我期待中研院能在現有二億字資料的基礎上，從研究需求的角度，把《新四庫》做得好一點，能在內容上建立標注，使這個資料庫不只是全文檢索的資料庫，而且是具有人工智能與類神經網絡功能的知識資料庫，才不枉十幾年來累積的經驗，也才能把資訊科技最先進的一面應用在中國古籍數位化工作上。中研院比較缺乏集部的資料，我這邊集部的資料是公開使用

的，合起來可以做一個比較好的《四庫全書》或者《新四庫全書》。我的回答到這裡，謝謝！

張健先生：

妳的資料庫中，有南宋的作家陳與義嗎？

羅鳳珠女士：

沒有。我們的資料庫中，北宋的作家比較多，南宋就只來得及輸入陸游、范成大、楊萬里等大家，至於戴復古、朱熹都還沒有。

李慕如女士（屏東師範學院教授）：

我有兩個很簡單的問題，第一個想請問陳教授，我剛才沒有聽得很清楚，中晚唐文學轉變，重六經教化而不重華靡之文，除了安史之亂以外，是不是還有其他因素？基本上我覺得你的論點非常好的，什麼時候我們可以見到全文。第二個問題我想請教羅鳳珠教授，我研究蘇軾花了很多時間，他的詩文一共將近八千篇，我很想知道今天你的資料庫輸入他詩文是不是已經輸入這麼多？用什麼版本？怎樣分類？願聞其詳。謝謝！

陳弱水先生：

其實個人研究的主題，不是古文運動，而是中晚唐士人文化中儒家復興的現象。除了安史之亂，中唐文學變化的發生還有哪些因素？我們或許可以從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區分來談。外在因素是安史之亂變局的刺激，文人社群構成的改變也是一個外在因素。至於內在因素，中國的文學思想在漢代是以儒家的政教功能主義為主流，雖然經過六朝緣情綺靡之說，以及玄學的影響，思想發生變化，漢代形成的舊傳統還在。譬如，華北平原的士人受到新思想的影響就比較少。中古的美文思想與個性解放運動，起源於漢晉之際士族社會的最高層，這個社群的成員在永嘉之亂前後，大都離開華北到南方去，留在北方的多是較低層的、守舊的家族。就整個中國而言，教化取向的文學思想是儒家思想整體的一部份，中國雖然經過魏晉的大亂，社會政治秩序並沒有根本的改變，因此儒家的舊傳統還在，是一股潛在的強大力量，隨時都有復甦的機會。就算在南北朝初唐，中國文學藝術思想最高張的時

候，文出於道，文學要為政教服務的觀念還是非常強，還是作為文學存在的一個重要的辯護理由。只要這股力量存在，它就有機會重新成長。至於我的論文什麼時候寫成，目前的想法是，不想利用這些材料寫成單篇論文，希望把這些見解放在一本關於安史亂後百年士人思想的書裡，至於書何時能成，我也無法預料。

我剛才忘了回答張先生一個問題，就是我對韓、柳議論的取材是不是過於偏頗，不能代表他們的思想。這是事實，其實我剛剛說了，我引古文家這些話，不一定能夠反映他們思想的全豹，以韓柳相比，韓愈對文學寫作創造性的一面更是強調。不過，從歷史研究方法論的角度來講，人不見得是一個永恆的、不能分解的單位，研究工作的主體有多重的選擇，它可能是人物、文獻、社群、觀念，或是抽象的問題，要看你的關心是什麼。我今天討論貶抑文學價值的問題，是以觀念為處理對象，貶抑文學的觀念在韓、柳的思想中雖然不能算是重要的部分，但它的確存在。我探討這個觀念的歷史涵義，將它與具體的文學家作若干程度的分離，恐怕是難以避免的。

王瓊玲女士（本所副研究員）：

我的問題正好跟您剛剛所提的問題有關聯。您發給我們的列表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在第二代山東士族裡面，韓愈是屬於較低階層的士族，而柳宗元則屬於南遷到淮河流域的士族。在文學創作與理論上，韓愈為文作詩均要求以奇矯俗，非常強調形式與風格上的突破。例如他以作文之法作詩、用僻字造怪句、用怪韻，開創出奇險僻苦一派之詩風；而就文章而論，韓愈亦極力摒棄駢驪排偶，求其文從字順，甚至不惜使文句詰屈聱牙，可以說他對所謂「美文」的刻意求新在中唐文人中是具有開創性地位的。以此對照於同時期其他階層的文人，韓愈在詩文創作與理論上之另闢蹊徑、獨樹一格，與其個人處於較低階層的身分是否有所關聯？您在討論古文運動時，將韓愈歸屬於文以載道的領域裡面，但事實上他在詩文兩種文類中的表現是個很特殊的例子，似乎不是古文運動對「文」與「道」的強調可以涵括的。這與韓愈係屬於較低層的山東士族，或說像柳宗元係屬於南遷的北族的現實狀況，其間是否有其關聯性？您今天所談古文運動中士族的階層與地域問題，對我們思考當時文人的創作與歷史情境的關係很具有啟發性，因此，我想請教您，以韓愈為唐代士人之一例，其遷移與階層是否也會影響到他對文學的理念？我想應該是有關聯的，不知道您的觀察如何？有沒有其他類似的例子？韓愈的例子與其他沒有南

遷之北族的第三代士族的情況，或其他所謂高層士族的情況比較起來又是如何？

陳弱水先生：

王小姐問到我行外去了，不過我想我們可以畫個線，我感覺從古文運動第三代以後，這個運動有擴散的現象，本來是比較集中在山東舊族身上，到後來越來越擴散，像劉蛻、皮日休、陸龜蒙都是純粹的南方人，孫樵也非士族。至於韓愈的家族背景跟他的文學思想、文學創作衝勁是不是有關係，這個我沒辦法回答，因為我們對他的家族史並不很清楚。不過我可以說，韓愈不是一個很有士族意識的人，他在文壇上最佩服的朋友孟郊是南方人，所以韓愈跟李華、賈至這些人確實不太一樣。探究中唐士人文化的問題，還須注意一個因素，這就是安史亂後士人大量南遷，江南有一段時間甚至成為全國的文化中心。這個遷移，對南北士人文化的交流有什麼影響，是值得考慮的。當然，家族南遷不一定代表北人和江南文化有深厚的接觸，因為有些家族遷徙的時間不長，可能只與北方家族來往，不見得跟在地人聯絡。至於柳宗元家族的南遷，中國中古是一個很複雜的時代，家族遷徙非常厲害，賈至有一句話說，士人是「東西南北之人」，就是這個意思。柳宗元家族南遷後再回遷往北，是在北魏的時候，離唐代中葉已經很久了，所以我想他家基本上是偏向北方傳統。不過他們家族一直在關隴集團裡面，關隴集團在文化上頗受南方的影響，因為他們跟荆襄的關係比較密切，柳氏家族受到文風薰染，可能比一般山東士族早。

羅鳳珠女士：

基於對版權的尊重，我們都採用已經沒有版權爭議的版本，希望將來能用新的校注本再重新校對。古籍校注是一件繁重的工作，香港中文大學的作法是由該領域學有專精的學者就古籍版本做活校，也就是說每輸入一部典籍，便重新校對該書，如果原書有錯誤，製作成電子版本時，除了保存原書原樣資料之外，還將校對資料補上，但我個人沒有足夠的時間，就算是只將電子檔案與原書死校都很難做到，更談不上活校，這個工作需要文史學界共同投入才有可能做得好。我覺得古籍數位化工作，比較好的做法是由文史學界主導，電腦資訊界與圖書館界協助，是一個最好的組合方式。今天我能夠做這個工作，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曾經在元智大學圖書館擔任過兩年的執行秘書，三年的館長，這個經歷以及圖書館學的觀念，對我從事文史資料數位化工作有很大的幫助。例如我在設計《紅樓夢》資料庫的系統架構

時，我就做了一個人名的全文檔，比如黛玉等於林妹妹，等於顰顰，等於瀟湘妃子，在文史研究方面，這樣一個同義詞全文檔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在期刊目錄部分，國家圖書館協助我們建立，我們就會作篇名的全文檔，比如說有一篇文章寫「蘇東坡詩研究」，我如果輸入「蘇軾」作為檢索條件，勢必檢索不到。國家圖書館幫我們做這個全文檔，或者叫參見檔，這個工作國家圖書館幫我們初步建立後，我們親自校對、檢查，因為我們有相關專業領域的背景，能將全文檔資料建立得更正確、更完整，這些工作我一個人根本做不到，所以期望大家都能夠來參與這個工作。

李豐楙先生（本所研究員）：

今天看了兩篇文章後，有一些感想。陳先生這篇文章，希望能趕快的寫出來。主要是因為文學研究者在對唐代文人活動研究的基礎上，與陳先生的研究可作一部份的結合，對於文學的研究會有很大的幫助。陳寅老的研究雖然引用了很多唐詩的資料，但是他的著眼點還是在歷史部分，如果把陳弱水先生的研究與文人文學創作的活動作細部的結合，可以解釋一些比較深一點的歷史現象，所以希望陳先生站在歷史的角度所提供的觀念與文學研究結合，這樣能夠有助於文學研究者對於文學現象的研究，比如說從六朝開始山東的舊族，他們相對於南方是比較保守舊學的傳統，這個傳統經過魏晉南北朝到唐代仍舊沒有改變，從他們對於經學的重視、對於古文的重視就可以看出來。這些山東舊族從六朝時代就形成，然後一直延續到唐代，中間當然會有些變，但是大體上舊土族的力量仍然存在有其影響力，所以可以透過土族核心人物幾個背後的集團，看他們如何傳遞他們的家學，學術如何傳承，又如何透過科舉保有原來的傳統。因為科舉制度興起之後，在開始的時候雖然有些挫折，但是隨著他們深厚門第的學術涵養，他們又在唐代的科舉中重新取得優勢。當然對於古文運動，研究文學的人可能比較會看文學發展的一面，如果能和史學的觀點結合起來，就可以更深一層去看，看看古文運動的背後有更深的意義，它所要宣揚的是什麼，它的作用是什麼？我想文史在這方面對話，可以把比較深的問題透過這種方式來做比較，所以我覺得陳教授的研究很有意思，可以把這些東西放在比較深的歷史脈絡上來看，陳教授把這文章寫出來之後，有助於把這議題背後比較深的問題看得更加清楚，這是我聽了之後的感想。

羅小姐的研究，我們都很關心，因為在中研院的漢籍輸入，雖然有一部份集部

的資料，但是這一部份還在進行中。使用電腦的人都知道，現在電腦是不可缺乏的基本工具，所以開發電腦工具的使用，對於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助益，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就像我們所裏《道藏》的輸入道理是相同的，就是說人的聰明智慧不必用在這些基本資料的搜尋上，而是用在分析或者是更需要訓練的專長上。電腦人要它多聰明就多聰明，它的基本能力對我們人類有很大的幫助。過去我和陳鵬翔教授談過類似的問題，他以前作中西秋詩的比較，那時候沒有電腦所以他用最基本的統計方法來研究。我們都了解如果用電腦來檢索，比如說秋除了直接的秋字之外，還有很多代詞，只要把這些相關的字在電腦上輸入，一下子就都檢索出來。所以他很感慨的說：如果他當時有電腦可使用，他的研究就可以節省很多時間，所以我想現在的文史工作者大概不會排拒這類工具。我也參加漢籍資料庫的計劃，在固定的月會中，就感覺到研究機構很偷懶，不願意再花更多的經費做基本資料的開發，通常是要等人家做出後再來作研究，然後用這成果來表示很有成就。這種情形包括中研院也是這樣，所有學科學的都說：你們做的工作根本不是研究院該做的，研究院的資源應該用在研究。這個資源如果研究機構不開發，又要等著誰來開發。所以新的學術委員也是這樣的觀念，不願意把更多的資源花在新資料的開發上，覺得研究人員就是要專注研究，而這成果才是研究院的成果，研究人員的工作是作研究不是做開發。所以他們希望台灣有一萬個像羅小姐這樣的人，開發研究資源，然後由我們來作研究表現成果。這是很矛盾的情形，而且這情況不只在研究院才有，大多數的人都有這種心態。我們做文史研究工作的人，需要調整一下心態，學習如何使用電腦工具，不過要學習尊重智慧財產權。杜正勝先生就曾抱怨過，現在會使用電腦的學者，他們從電腦網路、光碟中抓出很多資料，但是都不註明出處。今年在全國人文會議上，我們要提出一個建議：要建立使用電腦的倫理。很多人從網路上抓下資料卻不註明，有很多人的研究沒有電腦的輔助是無法完成的，所以要要求對方註明使用何種電腦資料。所以一月份的會議我們目前正在規劃，希望能建立一個使用電腦的倫理，這是學術的基本遊戲規則，我相信這個規則如果建立好，相關的問題就會浮上檯面，然後大家就可以遵守共同原則。史語所過去建立二十五史資料庫有很多的犧牲，我是加入他們的計劃之後才知道。我們如何讓電腦工具更精進，這有待大家研究改進，不過我參加這個大計劃後，覺得前途不太樂觀，因為我們團體學術太死了，如果國科會要做得更好，可以規劃多少經費用到電腦輸入的部分，但是國科會也是謹守著獎勵研究不獎勵輸入，像國科會的數位圖書館將來或許有這方面

的工作。我們希望明年的人文學術會議上，在科學倫理這一部份上，能夠把這個議題提出來。我很佩服羅小姐做這種基礎工作，像我們作《道藏》輸入的工作，最後一校的校稿工作我一定自己做，學生多只能做前面的兩校，最後一校一定自己看。像《道藏》裡有崑崙山，誰敢說能夠把《道藏》中的崑崙山資料全部找出來。所以到目前為止所有的道教研究在電腦使用上都還沒有科學化，研究只能一本一本的作，就是因為《道藏》還沒有電腦化。《道藏》是很特殊的例子，不過其他的工作也一樣。現在有一種研究傾向，利用電腦輔助研究，研究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在詩的研究方面，特別是在語言意象和詩的象徵意義，以及在整首詩的意象方面就可以發揮很大的用途。所以文哲所是以研究為主的單位，必須在某些研究中闡出新的研究視野，因為在新工具、新的使用方法上，可以使研究有更新的出發，所以我們應該要虛心的來接受這種新的研究工具。聽了兩位引言人的引言，覺得有很多值得我們去反省、思考新方向的地方。謝謝！

衣若芬女士：

謝謝李老師。不知道兩位引言人對於今天的發言有沒有要補充的部分。

羅鳳珠女士：

聽了李老師的這番話，真的是很感慨。我從事這個工作大概六、七年了，我非常幸運能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體認到我們所做的基礎工作是文化責任。可是在文史學門中，這種基礎工作不被當作研究成果，申請經費也很困難，我自己在中文系裡面，中文學門認為我偏向資訊學界，資訊學界認為我屬於中文學界，我就成了邊緣人。我相信在中文學界也有很多人跟我有一樣的理想，想做這方面的工作，可是環境上沒有我這麼好，我們元智大學的政策是以資訊化為優先，所以我在元智有比較好的條件可以做這個工作。可是再面對文史學界的的時候，很多人會跟我說電腦只是工具，你是學人文的，不要去做這樣的事情。我不覺得學人文就高人一等，今天，因為資訊學界的 effort，提供我們一個很好的工具，讓我們有機會享用資訊科技的甜美果實，但是怎麼應用在文史研究，我認為還是需要人文學界主導，所以我會往深度發展的原因，就是想建立一個更符合人文研究需求的資訊科技環境。我去年（1997年）因為與華盛頓大學的合作計畫，有機會應邀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做一個學術報告，順道參觀波音飛機公司，我有一個感想，飛機是飛行工具，但

是如何使它飛得更快、更安全，這些就需要持續不斷的研究支持。電腦對於人文而言，甚至於對於其他領域而言，它誠然是一個工具，是文史研究上新的研究工具，引用電腦作為文史研究工具，如何使電腦對人文研究的效益發揮到最大的極限，這個過程就需要人文學者不斷的研究，才能使電腦在人文的應用上更快、更好、更正確，更完備，讓電腦在文史研究上具有人工智慧，具有類神經網絡功能，這些都需要投入很多研究。電腦作為文史研究的新工具，已經是時勢所趨，這是一個潮流，個人的力量很難去抗拒，也沒有必要抗拒，當然我不覺得電腦是萬能的，人的判斷還是最重要的。

我非常希望我今天的報告，能讓大家知道，電腦使用起來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困難。這幾天在資訊展會場，我看到很多老先生和小孩，到了我們《紅樓夢》展場的時候，他們都會使用電腦去檢索裡面的資料。那麼我們當然更容易學會使用，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試試看。我們做出來的資料庫，主要的功能希望提供研究使用，其次才是教學，但是因為個人時間有限，我自己不可能從當中寫很多的研究論文，因為我比較希望朝著建立新工具的方向發展，希望在幾年累積的心得下進一步發揮，研究的工作由大家一起來作。我很願意將所建立的資料庫供大家使用，如果大家因此而得到更好的研究成果，我覺得我的工作會更有意義。當然剛剛李教授提到中研院史語所很多教授的共同的感慨是大家用電子資料不註明出處，我也覺得這一點實在是不好。另外一點，藉著李教授在場，我想說一句話，學術界用國科會的經費做出來的研究成果，應該要公開給學術界共享，那怕是讓使用者付合理的費用都可以，而不是只供自己使用，我想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尤其是電子資料庫，使用的人越多，周邊效益越大，經費使用的效益也更大，中國典籍太多，大家資源共享，可以避免浪費，於人有益，於己無損。我願意以身做則，也希望大家能尊重智慧財產權，遵守使用倫理，讓更多人願意參與這個工作。

陳弱水先生：

今天謝謝各位在座的先生女士的評論，我只有一點補充，是關於李教授對我文章的評論。其實我用英文寫過一篇北方士族與唐代文化的關係的論文，因為是用英文寫，知道的人比較少。我講一下簡單的結論，這篇論文考察北方兩個重要士族，博陵崔氏與清河崔氏，從德宗初期到五代後晉之間的文化形態。我得到一個基本結論，在唐末之前，這兩個家族在文化上具有雙重性格，這雙重性格就是說，它們一

方面想盡量維持家族內的嚴格禮法，另外一方面大量投入科舉考試，取得很大的成功，特別是到晚唐的時候，這就是我所說的文化雙重性格。結果到五代以後，禮法和經學都丟光光了，從表面看來，這是南朝形成的文學風氣淹沒了山東士族，使山東士族跟社會上其他知識階層的區隔泯滅了，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從古文運動參與人的背景來看，可以發現，山東士族（擴大來說，北方士族）出身的人其實在文學社群裡發揮了不少作用。所以從長期的觀點看來，這個社會集團在唐宋之際消失了，但他們的思想可能到宋代以後，成為中國主流思想的一個重要基礎。這個說法已經遠遠超出我的英文論文以及今天的演講內容所能支持的，只能提供參考。我今天來完全沒有想到會提到漢籍自動化的問題，我們所內同事有時也會談到，我們參與計劃的人花那麼多力氣時間，有什麼意義。我有時候會打個比喩，說資料自動化的工作跟經濟發展中的基礎建設很相似，跟搭電線、蓋橋樑、建捷運的性質差不多。我們在經濟發展上，會花很多錢在基礎建設上，可是在作研究上，好像比較沒有這種想法。這是我的一點看法，沒有意思要鼓吹倡導什麼，只是講一下而已。

衣若芬女士：

我們謝謝今天的兩位引言人。今天聽了兩位的引言跟各位學者專家的意見，我們發現從變的主題來看，像陳教授所說的時代變遷，或是地域的變動，或是土族、家族的組合和離散，都是一種「變」。羅女士給我們帶來「變」的訊息是，資訊科技對於文學的研究在思想觀念上產生很大的衝擊，甚至轉變我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這兩種「變」的趨勢接下來還會有其他的發展，一方面要靠各位繼續的努力，一方面我們要在時代上往下延伸。在此做一個預告，本計劃下一次的座談會是在明年的五月，我們請到的是本院近史所的熊秉真女士以及佛光大學的龔鵬程教授來為我們談晚明跟晚清文學與文化的問題。同時明年一月七日、八日，分別是星期四、星期五，我們有兩天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題目是「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換期的文藝現象」，歡迎各位屆時蒞臨指導。謝謝！